

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 实践样态、作用机制与提升路径

李雪伟¹，王晓晨²

(1.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玉林师范学院 体育健康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推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对地方性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体育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具有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价值。基于典型实践的梳理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挖掘，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体育可以通过展演活动、赛事活动、健身活动、教育传承活动等形式培育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并通过社会资本的 network、信任、规范等核心要素实现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公共精神的塑造、社会矛盾的化解、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促进。针对少数民族体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从社会资本培育的维度提出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治理要素、创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加大少数民族体育资源投入、完善少数民族体育扶持政策的建议。

关 键 词：少数民族体育；基层社会治理；社会资本；民族地区；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5)03-0056-07

Ethnic minority sports facilitat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Practical patter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ement approach

LI Xuewei¹, WANG Xiaochen²

(1.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 Health, Yulin Normal College,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ies in ethnic regions necessitates the effective tapping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Minority sports, as a distinctive cultural asset, holds significant potential in advanc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By examining typical practices and drawing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minority sports can foster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by performance activities, sporting events, fitness initiatives, and educational and inheritance programs, and these activities leverage the core elements such as networks, trust, and norms of social capital to shape grassroots public spirit,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 integrate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enhance collaborative and shared governance. Give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sports, the study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cultivating social capital, such as uncovering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s of minority sports, innovating the formats of minority sports activities, augmenting investments in minority sports resources, and then refining support policies for minority sports.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sports;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capital; ethnic regions; ethnic culture

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治理环境的复杂性、治理主体的民族性和治理能力的差异性而呈现独特的治理样态^[1]。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民族地区的内外部环境也

发生重大改变，尤其在民族地区对外互通互融程度不断加强、人口流动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不断涌现，给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面对公共精神日渐流失^[2]、文化

收稿日期：2024-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XTY007）。

作者简介：李雪伟(1992-)，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体育公共政策。E-mail: ruclixuewei@126.com 通信作者：王晓晨

冲突持续加剧^[3]、治理资源和治理机制碎片化^[4]等问题,民族地区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基层政权和法治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政治基础^[5],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地方性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中富含的治理价值,通过有效路径调动各民族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少数民族体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利用少数民族体育的多元价值,服务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对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和价值意涵进行分析。如王晓晨等^[7]通过对桂西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考察,发现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在价值导向、道德示范、文化认同、关系调适、社会整合等方面具有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与价值;李晓通等^[8]基于西南跨境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探析,发现少数民族体育对于边疆治理具有积极的辅助价值;金青云等^[9]以延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陈家明等^[10]以川西北地区为例,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探讨了朝鲜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体育对于精准扶贫、产业振兴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复合价值。上述研究不仅拓展了少数民族体育多元价值的应用场景,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界有关“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相对较少,对当代社会存在的价值功能研究相对匮乏”的论断^[11]。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实践案例的介绍较为分散,多嵌入在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等宏观背景中,缺乏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分类与整合;二是对理论逻辑的阐释不够深入,鲜有运用统一框架对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进行论述的研究。

为更好推动少数民族体育多元价值的充分释放,当前还需要系统回答以下问题: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表现形式有哪些?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产生作用效果的本质及内在机制是什么?哪些手段能够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治理价值的充分释放?基于此,本研究将在整合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理论构建逻辑分析框架,对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之后进一步以理论为指导,构建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以期与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1 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样态

推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除了厘清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以此明确行动的目标方向,更为关键的则是要挖掘并利用有效行动载体,依托其蕴含的多元价值释放积极治理效果。在对现有实践案例进行系统梳理后可以发现,少数民族体育主要通过展演活动、赛事活动、健身活动以及教育传承活动等形式,从文化认同、信任建构、规范约束、关系拓展等维度,发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

1.1 展演活动

展演是少数民族体育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活动融入民族地区日常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在特定的节日、庆典或生产生活过程中,人们通过展示和表演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一方面能够表达特定的情感价值,另一方面则能够依托体育活动的桥梁作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人们对民族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并藉由集体行动拓展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联系。譬如,在广西长乐板凳村蚂拐节节庆活动中,村民们通过“蚂拐舞”仪式展现祭拜蛙婆、敬拜铜鼓以及蛙婆领兵征战等文化符号,既能够表达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增福添寿、种族繁衍的美好愿望,又能够展示壮族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氏族集体文化。在定期的蚂拐节节庆活动和融入日常的蚂拐文化影响下,村民相互之间的情感连结和公共精神得到维系和传承,进而实现了当地村落社会长期的和谐与稳定。

1.2 赛事活动

少数民族体育赛事活动是以竞技对抗、文化交流、身体锻炼等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其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既包括正式、有组织的比赛对抗,也包括非正式的训练和表演。相较于日常展演活动,少数民族体育赛事在兼具文化性、地域性、象征性的同时,也更突出竞技性、规则性和组织性。因此,借助赛事活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除了发挥其促进文化认同的价值外,还体现为3个方面:一是利用赛事对抗的文明形式宣泄不良情绪,消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矛盾冲突;二是通过组织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参与的赛事活动促进民族间的互动交流,以此减少文化层面的冲突;三是依托赛事规则的制定执行塑造通用的行为规范,进而建构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以云南迪庆香格里拉赛马节为例,该赛事原是当地藏族群众最重要的体育活动,但随着纳西族、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先后迁居于此地,该项比赛也逐渐发展成为多个民族共同的节日活动。在赛马节的影响下,各民族之间不仅加强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促进民族团结,而且也形成了

能够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规范和准则。

1.3 健身活动

少数民族体育健身活动是对传统民族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旨在将民族特色体育项目融入日常锻炼活动中。由于许多民族体育项目强调集体参与,并且注重组织和规则,因此依托健身活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人们通过成立或加入各种类型的健身组织,不断扩大彼此之间的关系网络,并且在共同锻炼的过程中增强互信、建立关系,进而帮助组织成员纾困解难,或促成社区成员在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时的集体行动。譬如,新疆多地将维吾尔麦西来甫民族舞蹈改编为广场舞,吸引各族群众积极参与,一些地方还专门成立舞蹈协会和活动组织,负责广场舞的教学、宣传和创作。各族群众共跳麦西来甫广场舞,不仅增加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缩小民族之间的情感隔阂,而且还促进了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人们的密切交往与社会支持,进而提升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程度。

1.4 教育传承活动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蕴含的团结协作、和谐共生、互利互惠等理念,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形塑、道德规范的引领以及社会冲突的纾解等都具有积极作用。为了传承优秀文化,不断扩大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一些地区开展了包括学校民族体育课程教育、村落体育文化代际传承、节庆场域体育文化传播等在内的活动,将体育文化中衍生出的社会道德规训、精神感召力量等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价值以“润物无声”的形式作用于不同群体,加上不断融入的公民教育内容,不仅实现从前端防范社会矛盾产生的治理目标,而且还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理念的融合与传播。以广西马山为例,当地积极推动壮族“打扁担”进校园,探索“体教融合”创新模式,让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够更好了解和认同传统体育文化;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地不断加大扁担技艺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持续组织专业团队开展打扁担活动的宣传教育以及法律法规知识宣讲,使群众既能够从传统体育文化中获得精神感召,也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为其更好参与地区公共事务奠定思想基础。再如,流传于湘西一带的苗族岩鹰拳,以血缘和模拟血缘关系传承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建立覆盖全世界的稳定网络关系,而且对于增进人们情感联结、维系乡土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价值^[12]。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体育通过多种活动形式,既能够实现对基层社会价值观念和公共秩序的塑造,又能够以体育为中介,吸引人们参与更多

由民族体育衍生的公共事务治理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拓展关系网络和信任基础,从而助力提升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

2 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

2.1 社会资本: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变量

推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特别是各族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从思想、行动、规则、组织等层面,营造信任、团结、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促成人们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能够从动力、网络、制度等方面促进人们社会参与的独特资源,具有有效反映社会集体行动微观生成机制的理论价值^[13]。首先,区别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实质上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能够被人们投资和利用的社会资源。网络、信任、规范是其基本属性,同时也是社会资本助力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其次,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次,其中前者主要强调个体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获得各种资源,后者特指群体借助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为组织及组织内的个体增加福祉^[14]。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相互关联,能够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从而服务不同层次的社会治理集体行动。最后,社会资本又包含 3 种类型,其中,粘性社会资本源于具有相似特征的同质网络,反映群体内部的密切关联,受到信任和团结等因素的影响;桥梁性社会资本侧重于群体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连接关系,能够促成更大范围的合作;而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前两者相比更强调与具有权力、权威的群体建立纵向关联,特指组织与政府、市场之间建立的不对称的网络关系^[15],能够帮助组织获取外部权力关系结构中的信息和资源。

从少数民族体育的积极影响看,无论是哪一类活动,其都能够不同程度促进人们的互动交流,进而为建立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奠定基础。实际上,上述过程也与社会资本培育所需的要素和条件相耦合,即特定形式的少数民族体育具有培育社会资本的功能,同时藉由其生成的社会资本,又可以实现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以社会资本为“桥梁”,建立“少数民族体育-社会资本-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充分阐释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机制具有较高适切性。

图 1 是研究构建的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框架。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

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及其作用的发挥,而这主要包含两条作用路径:一是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生成并强化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个体和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二是不同类型的社会

资本通过网络、信任和规范特性,对影响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参与意愿、资源禀赋、合作机制等主客观因素产生作用,从而推动上述要素的有效耦合。接下来将对以上两条路径的作用机制展开具体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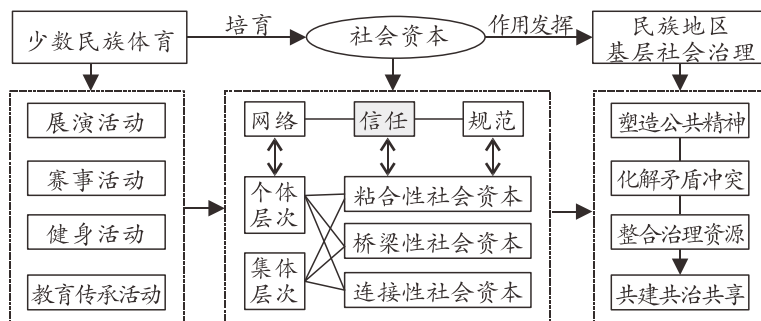


图1 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框架

2.2 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与社会资本的生成

从社会资本培育的角度看,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所具有的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价值,主要通过其凝聚社会信任、建构关系网络、强化互惠规范的方式间接实现。

1) 社会信任的生成机制。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文化规范,体现出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属性。在社会治理中,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等主体之间的信任,以及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信任^[16]。不同信任的生成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展演活动为例,该活动的开展范围一般集中于具有相同文化信仰的少数民族村落,且参与村民也具有较为相似的社会特征。在此背景下,当需要举行展演活动时,具有威望的村民就会组织动员其他村民共同参与,并通过多元协商明确活动的规则与流程。在活动组织、策划、协商与实施的过程中,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因互动得到增强,加之活动本身具有的文化信仰强化功能,也让乡村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特别是粘合性社会资本实现增量提升。与展演活动不同的是,教育传承等活动主要强化异质性主体之间的信任。原因在于,此类活动的开展通常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力量的共同参与,其组织协调的复杂程度相对更高,期间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也更为复杂,为保障活动的有效推进,就需要多元主体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与此同时,当民众与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形成互动,并由此加深对地方文化和国家政策的认同后,也会强化对公共部门的信任,从而影响桥梁性社会资本乃至连接性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扩展。

2) 关系网络的生成机制。

关系网络是多元主体之间信任、合作和权力关系

的联合体,在结构上因网络主体的地位不同而表现出横、纵向的关系^[15]。不同形式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生成的关系网络存在差异,并主要由社会资本的类型得以呈现。展演活动的筹办主要由同族、同村的居民参与,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关系网络就是典型的横向网络,该网络的特点主要为:网络成员身份相似且地位普遍平等,网络功能因成员所能提供信息和资源的有限而显得相对单一。比较之下,健身活动等所生成的社会网络则相对复杂,尤其是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人们的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差别较大,当各族群众因共同参与健身活动而产生互动后,能够承载和传递更多信息、资源的关系网络便会随之建立,并在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持续拓展。然而,尽管这一网络的成员结构更为复杂,但由于不直接与权力主体互动,且成员地位也相对平等,因此仍然属于横向网络。不过,一旦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直接涉及政府等权力主体后,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之间就会因地位的不对等而形成纵向网络关系。譬如,前文提到的跨民族、跨地区举办的体育赛事,已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特色节庆活动,而为了让此类周期性赛事能够有序开展,政府、体育协会、民族体育传承人和少数民族群众等异质性主体就会通过建立网络共同参与规则制定、赛程协商、资源协调等工作,进而深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3) 互惠规范的生成机制。

互惠规范并非某一特定组织的主观设计,而是多元主体在长期互动、博弈以及利益往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行动标准和秩序^[15]。总体来看,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能够促进两种功能的互惠规范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功能,即能够对参与活动的多元主体行为进行规范,

保障其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和要求;另一种具有激励功能,即能够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互惠行为,拓展相互之间的社会关联^[14]。具体而言,展演和赛事等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通常离不开具有约束功能的规则作为保障。为了使此类活动有序开展并延续传承,多元主体会通过协商互动等方式制定一套各方均认同的活动组织规则,并且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与体育活动相伴的规则也会逐步演化为具有仪式性质的制度文化,从而对人们的集体意识和行动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健身和教育传承等活动也能够生成具有激励功能的互惠规范。如在带动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同时,健身活动还会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相互协作的情感氛围,不仅能够激励人们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能够强化公众对集体事务的关注力和参与度。教育传承活动同样具有类似功能,通过传递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的教化、参与、责任等理念,其亦能够激发人们的公共精神,形成内化于心的柔性行为规范。

2.3 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少数民族体育培育的社会资本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社会基础,对于塑造公共精神、化解社会矛盾、整合治理资源以及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1) 社会资本塑造公共精神的作用机制。

公共精神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驱动与精神内核。从内在属性看,公共精神离不开认同、责任、参与、合作、互惠等要素作为支撑^[17],而这也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方向保持了一致,即社会资本能够为公共精神的塑造提供先决条件。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通常是公共精神中认同、合作、参与等要素形成的基础,且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各主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就会得到强化,相应的交易成本也会有所降低,从而为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种行动规范的形成,又能够发挥有效引导和激励作用,促使各行动者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责任、合作和互惠的意识。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少数民族体育所培育的社会资本主要从两个方面发挥对人们公共精神的塑造。一是借助粘合性社会资本,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纽带,塑造或强化少数民族群众对基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不断挖掘社会权威力量,加强对群众公共意识的有效引导,建立民族情感的共同体。二是借助桥梁性社会资本或连接性社会资本,不断拓展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价值空间,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挖掘多元价值、融合公共资源等

方式,让少数民族群众同政府、社会组织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联,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协同基础。

2) 社会资本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机制。

民族地区治理空间和治理结构的复杂性深刻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尤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叠加效应愈发显现,基层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冲突也呈现从民族内部向不同民族之间扩展的趋向^[18]。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利益协调,而协调的过程需要建立在充分信任、彼此尊重以及沟通渠道畅通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体育培育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加强互信降低社会矛盾发生的概率,以及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利益协调实现社会矛盾的化解。具体而言,从源头上降低社会矛盾激化的概率,主要借助人们参与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而形成的信任关系,不断深化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同时各类活动形成的互惠规范影响下,引导人们通过协商等方式化解潜在的利益冲突,这一方式无论是在传统单一民族地区还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都具有适用性。而当社会矛盾发生后,利益冲突的各方还可以借助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获取其他权威性主体的支持,并由其充当利益协调人或冲突调停者,从而提高矛盾调处成功的概率。当然,社会网络成员的结构会影响其所能提供资源的多寡,异质性成员占多数的网络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通常会高于同质性成员为主的网络。

3) 社会资本整合治理资源的作用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支持,包括能够提供服务并满足需求的各类信息、资金、技术、人力和物质资源等^[19]。尽管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资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总量仍然较为匮乏,且分布也不均衡,极大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所培育的社会资本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吸纳多元力量,畅通资源流动渠道等方式,促进了社会治理资源的总量提升和配置优化。具体而言,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动员的过程,且随着参与活动主体的数量不断增加,其构建的社会网络也将持续拓展。在信任和互惠规范的作用之下,网络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这也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参与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主体都有可能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且无论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还是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都可以借助社会网络实现各类资源的整合、协调与分配,使其更加高效、精准地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

4) 社会资本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作用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核心要

义,三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其中,共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体现“人人有责”的建设理念;共治强调采用恰当方式开展社会治理,彰显“人人尽责”的治理要求;共享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资源、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果,突出“人人享有”的发展目标。相较于一般的治理活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而且还需要充分挖掘地方独特的治理资源,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推动传统的自治、德治手段与现代法治手段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少数民族体育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由其培育的社会资本作为桥梁和动力,既能够实现对多元主体的有效动员,又可以塑造基层社会的公共精神,整合有效治理资源,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实支撑。具体而言,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加强了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而在信任与互惠机制的作用下,各主体之间一种超越自身利益的公共精神得以形成,成为动员各方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而面对复杂的治理局面,单一治理手段已显得捉襟见肘,此时“三治”融合就成为解决诸如文化冲突、社会矛盾等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下,基层自治与德治的力量得到有效激活,更多群众在体育传承人及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动员下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与此同时,借助民族体育文化教育传承等活动构建的连接性社会资本,也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拉近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为法治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造条件。当然,共建共治的最终归属在于共享,随着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民族团结、民族和睦的社会环境不断稳固,各族群众也能够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共享治理成果。

3 少数民族体育助力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提升路径

3.1 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治理要素,为社会资本培育提供价值基础

少数民族体育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还蕴含着民族独特的精神信仰、生存智慧和道德规范,在少数民族生存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稳定、团结、包容、创新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精神内涵与构成社会资本的网路、信任、规范在本质上高度一致。因此,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能够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并将其传递到民族地区广大群众之中,就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和所在城乡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为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持续壮大提供动力。具体而言,可以组织由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

承人、民族地区权威人士、社会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等构成的专业力量,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考察与调研,不断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丰富的治理要素,同时可以通过学术研讨、展演活动等方式,将成果传递到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和民众之中,使其运用各自手段推动少数民族体育多元价值的治理转化。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将少数民族体育与传统文化、现代生活、社会价值等紧密结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去粗取精,让真正符合主流价值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挥作用。

3.2 创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形式,为社会资本培育提供平台支撑

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有效集体互动,而互动形式、参与主体的差异又会影响社会资本培育的类型与质量。已有实践表明,参与主体越多样、参与意愿越积极、主体间交流互动越频繁,社会资本的培育质量也会相对越高。当前,少数民族体育可以通过展演活动、赛事活动、健身活动、教育传承活动等形式培育社会资本,但每项活动参与的主体类别、规模等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利用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更好培育塑造公共精神、调适共生关系、共享治理资源、构筑共治秩序的社会资本,还需积极运用创新手段,让更多主体愿意参与到少数民族体育的丰富活动中来,并且有更多的机会产生互动。譬如,展演活动、赛事活动可以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健身活动可以与体医融合、体养融合相配套,教育传承活动可以与公民教育、学校教育等相融合。同时,也要鼓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体育传承人等共同参与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创新发展工作中,形成多方联动、协同推进的共创局面。

3.3 加大少数民族体育资源投入,为社会资本培育提供动力支持

当前,少数民族体育发展还面临着场地设施匮乏、后备人才稀缺、覆盖范围有限等诸多由于资源投入不足而造成的现实困境,不仅阻碍了体育多元价值的充分释放,也影响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为更好利用少数民族体育的治理价值培育高质量的社会资本,还需要增强对少数民族体育的资源投入力度。首先,应加大民族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新建或改造能够用于开展传统体育项目的场地设施。其次,应加强少数民族体育人才的培养,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人员以及体育传承人等,同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培训基地,培育少数民族体育社会组织,以及通过传统体育进校园、进教材、进课程等方式,为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培养搭建平台。再次,应积极推动少数民族体育与旅游、文

化、教育、健康等产业相融合,通过打造品牌和项目,拓宽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渠道,吸引更多资金、人才参与其中。最后,应加大少数民族体育的推广与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民族体育文化,参与民族体育活动,为构建多元参与的支持网络创造条件。

3.4 完善少数民族体育扶持政策,为社会资本培育提供制度保障

无论是少数民族体育治理价值的挖掘,还是活动形式的创新,抑或是各类资源的投入,从根本上仍然需要有稳定的政策作为行动的支持和保障。尽管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专门颁布了包括《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等在内的政策文件,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政策的数量种类,还是政策的内容体系,都尚未实现对少数民族体育全面发展的有效支撑。鉴于此,应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推动少数民族体育与乡村振兴、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有机融合的专项政策,同时督促各地结合中央文件和地方实际,不断细化完善保障措施,形成推动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政策体系。此外,还要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确保政策能够产生实效。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少数民族体育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有效促进社会资本的培育与积累,进而为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效支撑。要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治理元素,推动活动形式创新,搭建多元化参与平台,推动体育资源均衡配置以及加强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更好发挥少数民族体育在促进民族互信、增强社会凝聚、规范集体行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周晓丽. 基于民族地区特殊性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及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11): 68-73.
- [2] 韦仁忠, 刘心悦.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理论谱系、模式嬗变及实践向度[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0(6): 72-81.
- [3] 刘莹, 杨桓. 从“嵌入”到“融入”: 空间视域中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9(4): 80-89.
- [4] 李俊清, 阳义南, 张领, 等.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笔谈[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1-40.
- [5] 陈艳, 张劲松. 近20年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的热点透视与趋势展望[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0(6): 65-73.
- [6] 贺金瑞.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5): 5-10.
- [7] 王晓晨, 乔媛媛, 蒲玉宾, 等.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生秩序逻辑及其参与社会治理路径——基于对桂西的田野调查[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8(3): 132-137+144.
- [8] 李晓通, 冯强, 李开文. 西南跨境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边疆治理辅助价值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4): 21-25+31.
- [9] 金青云, 徐嘉璘, 池龙浩.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体育精准扶贫模式与路径研究——以延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2): 22-31.
- [10] 陈家明, 蒋彬.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川西北地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4): 62-68.
- [11] 陈振勇.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40(1): 20-24.
- [12] 白晋湘, 郑健. 交往交流交融: 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J]. 体育学刊, 2022, 29(1): 1-8.
- [13] 方亚琴, 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7): 64-84+205-206.
- [14] 张艳. 社区体育整体性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 逻辑、困惑与路径[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9(3): 43-48.
- [15] ALDRICH D P, MEYER M A.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5, 59(2): 254-269.
- [16] 周结友, 陈瑜. 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互动的生成机制[J]. 体育学刊, 2015, 22(4): 28-34.
- [17] 张承安, 师晓倩. 社区共同体建设中公共精神的六个维度[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3(2): 34-38.
- [18] 朱筱煦, 袁同凯. 论教育与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2): 97-105.
- [19] 李学书, 黄辰辰. “五社联动”中社区治理资源的应用性分析——基于合肥市部分社区的考察[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24(3): 91-101.